

有个人独立，才有大国崛起

看了央视热播的纪录片《大国崛起》，觉得有些别扭。因为这个片子的命题和内容，都是以国家的观念作为基础的。如果以国家为单位去谈西方文明的发展，就会导致人为的割裂，看不到文艺复兴对整个西方的影响，包括对那些如今富足而安详的欧洲小国的作用。要谈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之路，回溯文艺复兴是难以想象的。

文艺复兴的主题，就是人的觉醒。那时候的进步青年，纷纷负笈到意大利求学，他们心中只有个人和宇宙的观念，而“人是宇宙的中心”。人文主义弥漫在所有学科之中，成为冲破中世纪枷锁的重要武器。

我们都知道美国的13个州在1776年脱离大英帝国宣布独立，发表了著名的《独立宣言》。《大国崛起》里面也提到了《独立宣言》中的名句：“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独立宣言》也提到了根据这些原则而制定的美国宪法。但是，仅有政府的认识和承诺是不够的，真正让美国站立起来的并不是政府，而是，仍然是，人的觉醒。

早在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就把人的觉醒与国家的振兴结合起来了，最典型的就是胡适的那句话：“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目的，去救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第31期）

可杀可不杀，一律不杀 死刑改革挑战“杀人偿命”

《新民周刊》第四十九期刊登记者专稿说，明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将统一行使死刑核准权。2006年11月7日，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就此指出：“凡是可杀可不杀的，一律不杀，杀了就是犯错误，要更加注重贯彻执行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

肖扬提出，保留死刑，但要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因

被害方的过错行为引起的案件，案发后真诚悔罪并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的案件，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在一些学者的理解中，“保留死刑”与“严格控制死刑”两个观点在法理上并不冲突，“保留死刑”出自惩治与预防犯罪的目的，而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要求各

级法院严格掌握和统一死刑适用的标准，目的是确保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

肖扬强调：“死刑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最严厉的刑罚方法，适用死刑，必须慎之又慎，真正使每一死刑案件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有评论认为，肖扬提到的四类慎用死刑的案件直接越过公众传统的“杀人偿命”的心理底线，首次进入“致人死亡也不必判死刑”的禁区。

公共信息不该成为牟利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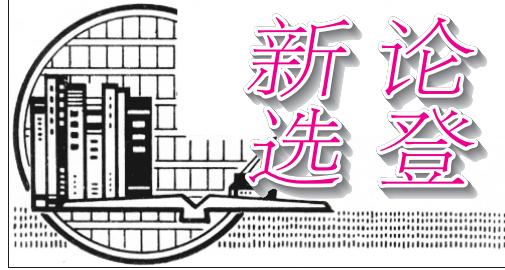
《新华每日电讯》11月27日刊登记者专稿说，近年来，交通违章查询收费、考试成绩查询收费、机场航班查询收费、银行卡跨行查询收费……越来越多的公共信息变成了一些行政机构和垄断企业的收费项目。

“考试成绩等信息本属于公共资源，某些单位和部门凭什么将它变成收费项目？”这是记者采访中经常听到的议论。那么，公共资源到底该不该都用来进行商业化运作呢？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员胡钢认为，公共信息查询是否该收费，首先要看这种信息是否属于政府信息范畴。如果属于政府信息范畴，则应该免费提供，否则不排除收费的可能性。

公共信息收费项目的主体主要包括行政机关和企业。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徐亚文指出，行政机关直接收费无法律依据，但是为了追求部门经济利益，会采取变通的办法，用招标或协商的方式与电信运营商签订合同，将政府的公共服务行为转化为企业的商业牟利行为，从而逃避政府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审批和监管。可以说，行政机关并没有直接利用公共资源牟利，而是在向电信运营商部门出售自己的权力，用权力谋取私利。结果，公民一方面为政府的服务缴纳了税，另一方面又作为消费者购买政府的服务，成为政府公共服务的双重买单者。

有关专家指出，政府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体系应当为社会公众提供更为人性化、更为便利的公共服务，而不应将公共信息资源变为牟利工具。



警惕腐败认同感的蔓延

林治波在中国党政干部论坛第十期上撰文说，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人们对于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见怪不怪了。他们耳闻目睹的典型场面是：

一些有攻势的人得意洋洋地游走于各种高档娱乐场所，吃香的、喝辣的、穿洋的、玩贵的，手里拿着几个国家的护照，把孩子送到国外最好的学校，把从贪污受贿等不法途径得来的钱财大部分转移到国外，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就溜之大吉、逍遁法外。

文章指出，在当前形势下，减少和铲除腐败认同的根本办法，就是要让人得名利、贪官受惩处，采取种种措施，使腐败的成本和风险最大化。

低，何乐而不为？

官场风气，不可避免地会波及民间。面对官场上的种种腐败现象，一些群众一方面愤愤不平，议论纷纷；另一方面又抱着宽容甚至羡慕的态度，觉得当官就是这个样子，自己一旦做了官也要如此这般，妨而效之。

文章指出，在当前形势下，减少和铲除腐败认同的根本办法，就是要让人得名利、贪官受惩处，采取种种措施，使腐败的成本和风险最大化。

农民经合组织需要引导扶持

□林宪振

近年来，随着全国农民合作社的蓬勃兴起，新型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已成为推动农村体制改革，加速农业产业化进程，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的有力抓手。马村区在创办和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实践中，注重引导扶持，有力地促进了全区农民合作社的健康发展。

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创办过程中，我区积极转变政府职能，改过去的直接领导为现在的支持引导，坚持把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区情村情结合起来，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收到了良好效果。一是正确引导，稳步推进。牢固树立“民办、民管、民受益”的指导思想，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做到推动而不强迫、扶持而不干预、参与而不包办、献策而不决策，更多地运用市场手段和优惠政策，推动、扶持、引导合作社发展，鼓励农民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个人自愿、形式多样、自主经营、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的原则下，创办和

发展符合本村实际、具有自身特色的农民合作社。全区结合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按照“一乡一品”的总体产业布局，从2002年组建第一个农民合作社，到目前已发展以食用菌、无公害蔬菜、干鲜杂果、畜牧、农机具等为主，涉及多种多样的经营门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22个，注册登记农民经济合作社9个，其中3个合作社拥有自主品牌，所有合作社注册资金达120万元，入股社员达231户，辐射带动农户680户，年帮助农民增收90余万元，有效克服了农民单打独斗、势单力薄，难以抗御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等困难。二是突出重点，搞好服务。在服务过程中，重点做好了两个“送”，即送政策、法律法规下乡和送科技服务下乡。区政府主要领导、各街道办事处负责人深入乡村农户、田间地头，宣传有关政策，讲解法律法规，分析探讨问题，了解实际困难，帮助农民群

必须是规范有序的，要求支持的项目必须前景广阔且已产生初步效益的，社员必须首先投资到位且仍有资金缺口的，政府投资必须是有偿的。根据上述条件，我们通过对安阳城南核桃合作社发展新品种项目进行资金有偿扶持实践，有效扭转了过去曾出现的社员无利不参与、见利盲目干、政府投资打水漂的被动局面。

针对目前全区70%以上的合作组织处于松散半松散状态，服务内容局限于提供信息、技术等现状，我们重点帮助合作社解决了四个问题：一是注重自身教育，提高农民素质；二是健全各项制度，规范内部管理；三是创新服务机制，提高竞争水平；四是拉长产业链条，推进规模经营，实现了产供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经营，将千家万户小生产变为大生产，有力推进了农业产业化进程。

（作者系马村区区长）



由中共焦作市委党校党委副书记杨家卿副教授撰著的《走进新的伟大工程——执政党建热点问题研究》一书，近日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创新的党建读物，是一个社科工作者在执政党建问题研究方面多年悉心探索的成果。

视角独特、力求创新是该书的一大特点。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既是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是时代的强烈呼唤，也是党的几代领导人率先提出并要求全党为之奋斗的宏伟目标。从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到改革开放后提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我们党始终没有放松加强自身建设，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问题提得更加响亮。改革开放后提出的“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建设目标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邓小平南方谈话，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坚强领导核心；第二阶段是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到十六大召开，目标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第三阶段是从党的十六大到现在，目标是以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作者研究的视角大体是从党的建设第三阶段开始的。

主题鲜明、内容丰富是该书的另一个特点。作者认为，创新党建理论，是全党面临的长期任务，需要我们每个共产党员脚踏实地、孜孜不倦地研究探索，唯此方能窥其真谛。尤其是作为一名党的理论工作者更是责无旁贷。正缘于此，作者多年来博学善思、笔耕不辍，深深地历练于生活、工作、学习、实践中，所思偶得积少成多，便成就了一篇篇文章、一部部书卷，不为虚名小利，只为尽一分社会责任。

该书共七章，计24万字，从“洗脑换魂论创新”、“血肉联系话党群”、“治理顽症找对策”、“终身学习看政党”、“文明农村探途径”、“执政建设重能力”、“评判得失议政绩”等方面，精辟论述了创新观、群众观、制度观、学习观、农村观、执政观、政绩观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热点问题，构思精巧，逻辑缜密，论证充分。该书章节分明，独立成篇；合，则浑然一体，是一部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入思考、系统研究执政党建设热点问题的新作。

（作者系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

王安石变法的消极影响

李裕民在2006年第六期《陕西师范大学学报》上撰文说，王安石实施变法的途径主要有四条，即设立变法的专门机构、鼓励神宗独断、改变监察机构的性质、用以是否拥护新法为标准。它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使皇帝时代最为进步的机制——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体制遭到了破坏，民主性减少，专制性加强；监察机构成了政府的附庸，为权臣的产生开辟了道路；实用主义的用人路线，使社会风气大坏，投机钻营者得势，贪污贿赂成风，政府成为腐败的温床。

典当行遭遇新难题

本报记者 张蕊

由于手续烦琐，我市某典当行的增资扩股计划已经搁置了3年之久；由于个别客户缺乏诚信而造成死当，给一些典当行造成了经济损失；由于缺乏专业技术人员，我市典当行业一直没有开展古玩、字画、名表、艺术品等专业性比较强的业务……据了解，市民对典当行认知度不高，典当行融资困难、用款户诚信危机以及专业人才的缺乏成为制约我市典当业发展的瓶颈。

认知遭遇误区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典当行这一古老的行业以崭新的面貌悄然来到我市市民身边，成为中小企业和老百姓理财的新渠道。然而，老当铺曾经给人留下的讳莫如深的印象至今仍然印刻在部分市民的脑海中，有的市民在资金遇到困难时不愿意进典当行，有的市民来典当行办理业务时要求给予保密，有的市民则把典当行和寄卖行混为一谈，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我市某典当行负责同志说，目前进出典当行的市民大多是家境宽裕人士，他们有房、有车，有黄金，办理典当纯属融资或救急，一些颇具经济头脑的精明人士已经将其作为融资理财的新渠道。此外，我市一些寄卖行以高息从事非法典当业务，扰乱了正常的典当市场，市公安、工商、商务等部门曾联合对其进行查封，市民在办理典当业务时，一定要查看典当行有无国家商务部颁发的典当经营许可证和市公安局颁发的特行证，以保证自身利益不受损害。

融资遭遇尴尬

据了解，我市典当行在为他人融资理财之时，自身融资却进入尴尬境地。我市一家典当行的董事长在谈到自身融资问题时，显得非常无奈。他说，他所经营的典当行成立于2000年，注册资本为500万元，随着业务的发展，原有资金明显不能满足业务需求，急需增资扩股。然而，典当行的增资扩股必须经市商务局、省商务厅、国家商务部层层审批，烦琐的手续令人望而却步。此外，尽管《典当行管理办法》规定典当行可以从事金融贷款，但由于金融部门对这一新生行业缺乏了解，造成典当行融资困难。

专业遭遇空白

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古玩、字画、名表、钻石、艺术品等民品典当是典当行的一项重要业务，而我市典当业一直没有开展这些专业性比较强的业务。某典当行的负责同志道出原委：我市收藏古玩、字画的人少，懂行的人也少，更重要的是我市缺乏相关专业鉴定人才和专业鉴定设备，所以这些风险高、变现难的业务，典当行一直不敢开展。

诚信遭遇危机

典当业属短期借贷，靠资金快周周转实现赢利。然而，典当行在简化程序、以最快速度给客户办理贷款的同时，却会遭遇个别客户的诚信危机。市恒信典当行董事长靳继忠说，他们以前办理典当业务是“认物不认人”，经过6年的摸索，现在是“既认物，又认人”，培养了一批诚信的老客户群体，对他们的业务进行从优、从快办理，而且可以享受较低的利息。市金信典当行董事长马福生说，典当虽说是实物质押，但一旦造成死当，当物的处理可能会给典当行造成损失，他希望用款单位在办理典当业务时一定要注重诚信，树立良好的信用形象。

广告

联系电话：3924268